

· 两会时间·委员声音 ·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分别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随着全国两会脚步的临近,北京商报将重点关注委员代表的相关提案及议案。



个税以家庭为单位纳税

北京商报讯 (记者 蒋梦惟 实习记者 王寅浩)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2月27日,农工党向全国政协提交《农工党中央拟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案》(以下简称“提案”)。提案认为,我国从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人口政策发挥作用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现行个人所得税在降低居民育儿支出方面存有一定缺陷。所以提案建议,加快个税改革降低抚养成本,提高生育积极性,个税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生二孩可退税。

提案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为个人,未考虑居民整个家庭的收支状况,这不仅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减轻育龄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从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看,无论是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还是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项目,这些项目的费用扣除中均没有单独的育儿支出项目,按照当前一刀切的税制设计,不考虑实际赡养系数,“全面二孩”实际上提高了居民的税负水平。

针对这一情况,农工党政协委员提出建议,以家庭为纳税单位,构建以综合课征为主、分类征收为辅的混合型模式。采用“反列举税目”的方法确定征税范围,对列举项目免征、不列举项目课税,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纳税人不同、所得项目不同、支付方式和时间不同等导致的税负不公。在税收优惠中增加生育二孩家庭的税收激励,可对其退税,也可仿效残疾人工资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的做法,允许雇佣生育二孩女性的企业进行税前工资加计扣除。



放松A股IPO定价限制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实习记者 孙颖妮) 针对目前IPO审核标准以及A股首次公开发行定价过高的问题,2月27日,北京商报记者获悉,致公党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关于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提案建议,优化和调整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首发准入标准,逐步放松对A股首次公开发行定价限制,进一步提高A股首次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化程度。

据悉,目前IPO的审核对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运行规范、运营独立性、财务数据等多重维度都有较高标准要求。致公党中央建议,根据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的不同市场定位,结合A股IPO审核的实际准入标准,对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首发准入标准进行优化和调整。允许新三板内部形成不同市场层次,其中创新层及以上市场层次与创业板在服务对象和准入标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提案进一步建议,证券监管机构在新股发行实现常态化的基础,上应逐步放松对A股首次公开发行定价限制、发挥市场对发行价格和发行规模的决定性作用。以发行定价市场化为先导,稳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致公党中央还对新三板改革提出建议,建议应深化新三板改革,通过引入公开发行机制、丰富投资者类型、实施差异化制度安排,提高新三板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建议完善新三板发行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新三板创新层挂牌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建议在新三板创新层进行公开发行股票试点,允许创新能力强、诚实守信、市场前景好的创新层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投资者准入、交易机制方面予以适当的配套措施。



试点房地产空置税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张畅) 2月27日,记者获悉,九三学社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建议的提案》(以下简称“提案”)。提案建议,发挥国有企业的引导作用,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必要时试点空置税,减少空置和“捂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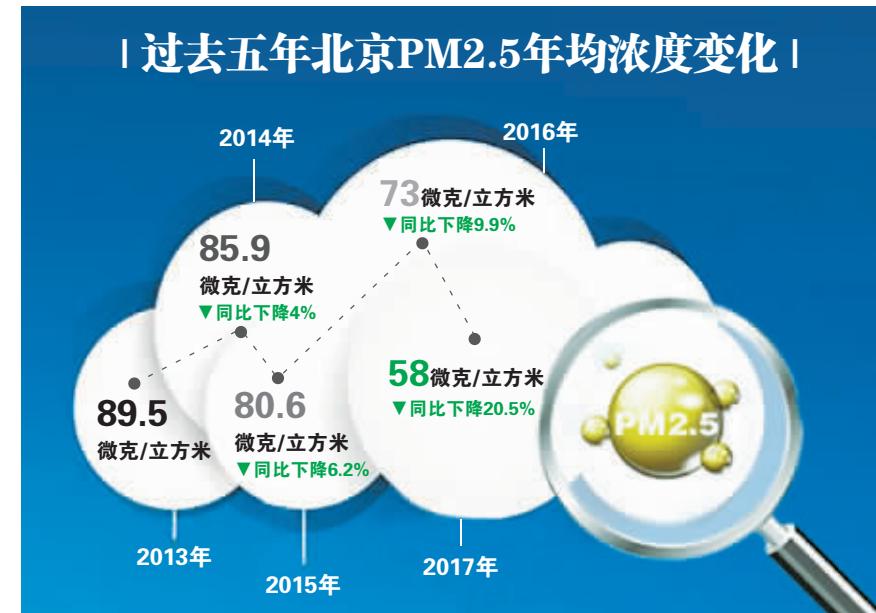
提案表示,早在2008年11月《住房保障法》就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但“降格”后的《住房保障条例》至今仍未出台。导致房屋买卖这一重大交易事项缺少有针对性的规制和保护,房屋租赁中的租金水平、中介责任、纠纷处理等问题缺乏权威约束。

为此,提案建议尽快补上房地产市场法律法规短板。应在《住房保障条例》基础上,尽快出台完善相关实施细则,加强房地产经纪行业管控,参照建筑工程质量责任对房地产经纪行为实施责任终身追溯机制;进一步落实地方责任,确保物业服务相关法规执行,提升群众居住环境改善获得感。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必要时试点空置税,减少空置和“捂盘”。同时,还要加快研究“70年产权限制”相关法律问题。同时,应对租赁房屋租金水平及增长率、中介人员长期责任等做出详尽规定,必要时上升为法规甚至法律。

据了解,房地产税制定曾被列入去年的立法工作计划,不过业界普遍认为这一税种开征时机未到。有分析指出,房地产税落地的最大阻碍是较高的税负压力,仅是土地使用税、增值税等五项税种,在我国税收总额中的占比就达到了12%左右,再加上房地产相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对纳税人而言将是不小的负担,如何实现普遍收税、规避拖欠缴税,将极大考验税务机关的执行力。

“人效”显著 北京污染物浓度大降

责编 陶凤 美编 张彬 责校 王坤 电话:64101946 bbtzbs@163.com



各项被称为“史上最严”,长出牙齿的大气治污措施正加速释放治理效果。2月27日,环保部召开了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环保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介绍,日前环保部向京津冀“2+26”城市提出3月底前PM2.5平均浓度、重污染天数均要同比下降15%以上的目标,其中,北京、石家庄等城市降幅需要达到25%。对于近年各项减排措施发挥的实际效果,刘友宾表示,近五年,京津冀“人努力”在PM2.5浓度下降中贡献比例达到了80%,而在去年北京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的15微克/立方米中,这一占比也达70%,这意味着,即使去年北京气象条件与2016年相当,也基本能实现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

拉低“10微克”

“针对空气质量改善,网上经常有一个说法叫人努力、天帮忙,用它来简单概括改善的原因。”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直言:“我们在研究大气污染原因的时候也经常提到这一说法,即内因是排放,外因是气象”。

据悉,2016年初,按照国务院要求,中国工程院组织了50多位院士专家,针对《大气十条》实施前三年的情况进行了中期评估。当时,专家对《大气十条》实施的结果预判认为,到2017年底全国和重点地区完成《大气十条》空气质量改善的颗粒物浓度降低目标是没有问题的。”贺克斌表示,然而,与此同时,现实中也存在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首先,北京市要完成PM2.5年均浓度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难度很大,必须要下决心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全面推进区域联防联控;其次,冬季的重污染天气非常突出,必须下大力气来降低采暖期的重污染峰值。提出这两个问题以后,我们也提出了散煤治理等十条政策和措施方面的建议。”

实际数据显示,去年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从2016年的73微克/立方米降至了58微克/立方米,贺克斌介绍,其中,从73微克/立方米下降至63微克/立方米主要是减排措施的效果,而从63微克/立方米进一步下降则是气象条件的贡献”。

治本之策

“2017年,北京的跨年霾出现以后,我压力很大,因为这七天北京的PM2.5累计了1800多微克/立方米,如果平均分摊到365天,每天就增加了约4微克/立方米。这意味着,北京实际上要从去年初的78微克/立方米降到60微克/立方米左右。而前四年,北京从89.5微克/立方米降到73微克/立方米,一共降了16.5微克/立方米,可见,北京的大气治污任务十分艰巨。”环保部大气环境管理司司长刘炳江表示。

刘炳江直言,在过去的环境管理过程中,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存在着区县大气污染比城区重的现象。经全面调查研究发现,散乱污企业是重要原因。因

此,我们采取拉单挂账的方式,共计整治完成涉气的散乱污企业6.2万家。”

同时,每次重污染天气过程中,燃煤的污染贡献非常高,而这也是刘炳江口中京津冀划定“散煤禁燃区”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仅去年,京津冀“2+26”城市完成电代煤、气代煤397万户,替代散煤1000多万吨以上。

此外,过去几年,北京市PM10浓度总是居高不下,降尘污染严重。对此,北京通过增收扬尘排污费等市场化的手段开始重点治尘。

归根结底,在业内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要解决大气污染的问题,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才是治本之策”。

具体来说,刘炳江介绍,通过近年的治理和北京经济结构转型等渠道,当前北京市的污染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目前,北京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耗量的占比只有个位数,平原地区已基本实现无煤化;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了80%以上,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已基本相同;油品质量也从国四提高到国六,黄标车全部淘汰。”

刘炳江表示,北京去年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没有单双号限行,除了几年来自身的不懈努力,也有周边京津冀“2+26”城市共同做出的贡献。刘炳江举例称,近年来,京津冀区域内各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减排量大幅增加,橙色预警的工业企业减排力度相当于以前的红色预警。除了北京、天津等工业占比较低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橙色预警各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要下降30%以上。正是因为区域的污染排放量大幅度下降,加上北京市持续调整能源结构,使得北京自身的排放强度也大幅度下降。”刘炳江表示。

治霾新阶段

刘炳江提出,目前,北京已经从工业煤炭为主的排放,转向了以生活为主的排放,当主要矛盾变化的时候,机动车排放影响就进一步凸显出来。

据悉,多个国家级团队就北京污染构成进行研究后发现,机动车排放是当前北京PM2.5的第一来源,现阶段拉高北京PM2.5浓度的首要来源就是硝酸盐,已经远远超过了硫酸盐,而这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刘炳江明确,今年,北京将把机动车污染治理作为工作的重点,精准施策、靶向治霾。

“即使采取了各种减排措施,产业结构也出现了较大调整,北京市的PM2.5年均浓度仍只达到58微克/立方米,离新版北京城市总规提出的2030年35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彻底改善的要求相差还很远。”

刘炳江透露,百姓不在乎PM2.5浓度下降了多少,更在乎绝对值的高低,而正是因为有60微克/立方米的绝对值目标,也推动了以打击散乱污为主的督查行动等措施的推进。因此,专家均建议我们要用好绝对值目标。因此,下一步环保部可能会基于不同区域提出不同的PM2.5绝对值目标。”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文 张彬/制表

X 西街观察 Xijie observation

祛魅区块链

韩哲

2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三篇区块链的文章,传递出区块链不是洪水猛兽的信息。这让后者从犹抱琵琶变成登堂入室,也将区块链热度推向更广的普罗大众。

自2017年的“9·4”监管以来,比特币们在国内被明令禁止,ICO被定性为非法融资,但作为数字货币底层技术的区块链,进入2018年后却大红大紫。创投圈的鼓噪和互怼,被媒体聚焦的“币圈”造富神话,春节期间走红的“3点钟无眠区块链”,乱花渐欲迷人眼,飞入寻常百姓家。

区块链的迷之魅力在于看不清。在蜂拥而至的资本、颠覆性的技术变革预期和强监管现实的合力下,区块链的焦虑一览无遗。拥趸们视之为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反对者则称之为“有毒的鸡汤”、换个马甲割韭菜和换个吃相圆钱。

区块链很难用三言两语进行通俗化解释。它

之所以被认为是革命性的,很大程度在于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特质。当代日益繁杂和精密的经济系统内,中介是一个庞大并且强大的存在,主导了我们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称是“中介垄断”。

从银行到BAT,无处不是中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搭桥,做“渡口”生意。

发达的中介是大工业生产和规模经济的必然要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三驾马车”,分工就居其一,其他两个则是技术创新和贸易全球化。分工,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形成了中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市场交易成本。市场经济不是熟人经济,必须藉由中介来完成信用担保和信息对称,从而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交易。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成功密钥之一。

区块链被人传唱的最大“史诗”,就是一个不要中介的愿景。如此市场的交易成本将大幅降低,市场结构重新洗牌,原来的巨无霸企业退出历史,

区块链新贵将占据舞台中心位置。可以说,一旦区块链技术被赋予这种历史性的、哲学性的修辞,狂热在所难免,有人利用这种狂热也在所难免。

距离产生美,神秘导致崇拜,不懂引发套路。十八世纪的密西西比公司,在别有用心和不明真相的人们的争相建构下,成为一个遍地金银、流淌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最后,这个财富神话轰然倒塌,掏空了法国中产阶级,也透支了波旁王朝。区块链本身是有价值的,但眼下炒作区块链的套路与密西西比公司如出一辙,亘古未变。

区块链,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尘埃尚未落地。除了沦为炒币的代币,它的应用场景还存在于脑洞,对形成当前经济系统的“中介垄断”的反戈一击,仍是纸上谈兵。马克思·韦伯用祛魅一词来描述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正在被神化的区块链技术,也需要一场祛魅,才能让投机离场、技术进场,这反而或许是区块链真正生机的开始。

我国对外投资管控的松与紧

北京商报讯(记者 蒋梦惟 张畅) 2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开今年一季度税收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会上,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刘宝柱介绍,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增加综合抵免法、扩大间接抵免层级等优惠政策,从而有效降低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负担。与此同时,相关部门针对非理性对外投资监管的力度仍在收紧,分析认为,这表明我国对外投资政策一松一紧”的态势愈加明确。

刘宝柱介绍,本次《通知》增加了综合抵免法。据此,同时在多个国家投资的企业不用再分别计算来自于不同国家的所得和抵免限额,而是采取统一计算的方式,这样一来,低税率的抵免余额可以调剂给高税率使用,高税率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也可以得到抵免,使得企业的抵免更加充分,有效降低企业境外所得总体税收负担。

与此同时,《通知》还将间接抵免层级由三层扩大至五层,使现有政策设计更加契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得企业抵免更加充分,有利于更好地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对此,刘宝柱分析称,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越来越多“走出去”,有时需要在境外投资架构中设立多个直接和间接控股的中间层平台公司,以实现对境外实体经营企业的控制,原来抵免不超过三层的限制难以完全适应企业“走出去”的实际情况,因而《通知》做出了一定调整。

近年来,我国鼓励企业“走出去”政策不断加码,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带动优势产能、优质装备和技术标准输出的境外投资等不断受到扶持政策倾斜。

不过与此同时,不少到海外市场寻觅新商机的国内资本也选择了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以体育俱乐部投资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15—2016年,内地企业海外收购的足球队数量已达12支,耗费资金超过150亿元。

对此,商务部部长钟山曾表示,我国有少量企业“走出去”存在着盲目、非理性的行为,到境外投资和发展难以为继,甚至对国家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非但不鼓励盲目、非理性的投资,还要对涉嫌其中的企业进行监管”。

为此,去年以来我国不断收紧非理性对外投资监管力度,相关部门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受此影响,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连续多月没有新增项目。

“过去部分企业投资决策较为盲目,到了交易落地项目启动,才发现前期规划不符实际,最终自食苦果,而类似于海尔收购通用电气、美的并购库卡等投资,能帮助企业获取市场份额、实现与高科技公司合作,才是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表示。